

中央银行 史话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央银行史话

责任编辑：张晓彬

中央银行史话

寿充一 寿乐英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7年10月第一版·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25 字数：133千字

印数：1—10,500册

ISBN7-5034-0024-2/K·0023

统一书号：11224·269 定价：1.35元

目 录

中央银行兴衰简史	李立侠(1)
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建立	寿乐英(6)
任职十二年之久的孔祥熙	李立侠(11)
宋子文、贝祖诒时期的中央银行	李立侠(31)
张公权与中央银行	李立侠(43)
两度任职的俞鸿钧	李立侠(57)
刘攻芸的最后挣扎	李立侠(74)

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破产真相	夏晋熊 余壮东(77)
回忆“四联总处”的十年	钱大章(86)
张公权三上庐山之谜	杨志信(106)
军统系统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内幕	邓葆光(108)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简述	刘元功(120)

附 录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汪时璟	欧阳载祥 王声扬(129)
中央储备银行见闻	胡宣同(144)
中储行与周佛海、钱大槩	(154)
编后记	(163)

0752/08

中央银行兴衰简史

李 立 侠

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1928年到1937年；第二阶段，1937年到1945年；第三阶段，1945年到1949年。

这里所介绍的中央银行，是指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银行。在这以前，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国民党政府都成立过中央银行，但与1928年11月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并无连续性。1928年成立的中央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迁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到上海，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中国人民银行所接管，前后历时20年6个月，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着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整个过程。

第一阶段 1928年到1937年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次年又攻占了北京，东北四省和平地更换了旗帜。这时候蒋介石除了力求巩固他的军事政治地位外，在财政经济方面也企图获得统一和加强。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同年7月又在南京举行了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是由当时工商界人士和部分经济学者所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这两次会议为制定一项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建议方案。

当时负责财政金融方面事务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经济和

财政会议以后，他筹建了中央银行，并兼任第一任总裁。中央银行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开始时中央银行的力量，远远不及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交两行从清朝末叶至北洋政府时期，历来都是以国家银行的姿态出现于国内外金融舞台。特别是中国银行，它的实力和基础都远远比中央银行雄厚。以发行钞票为例（这是当时银行实力的重要表现），1928年底中国银行发行总额为1.7亿余元，交通银行为6800余万元，而中央银行仅为1100余万元。

1928年以后，中央银行利用其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了它的业务，增强了它的实力，加强了它的基础。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也作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有关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有下列各项：（1）对中国、交通两银行实行增资改组，把中、交两行置于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成为两个专业银行。（2）实行废两改元，把混乱的银本位制统一起来。（3）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改采金汇兑本位制，摆脱了因白银价格波动对货币的影响。从此把货币金融方面的混乱局面，逐步统一和安定下来。

在这些改革中，国民党政府曾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来华协助。1929年曾邀请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教授甘末尔及其一行来华，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甘末尔委员会的货币改革方案。1935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法币改革。甘末尔的建议，主张采用金本位制，这种制度在当时虽然是全世界通行的，但中国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条件。至于法币改革计划，原来是由中国人草拟制订的，李滋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协助和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中国货币和金融经过一番整顿和改革，由“群雄割据”的局面，逐步趋于“统一”，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中央银行在这一时期中，也相应地增强了地位。到1936年底，中央银行的发行额，已增加到3.4亿元，中国银行发行额为4.6亿元，交通银

行发行额为3.03亿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额为1.6亿元。中央银行发行额的迅速增加，反映了它当时在金融方面已逐步站稳了脚跟。

第二阶段 1937年到1945年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央银行总行即迁往重庆。在这一阶段初期，中央银行虽然已有相当发展，但力量还不及当时的中国银行。因此不得不借用“四联总处”名义，把中央、中国、交通及中国农民四行联合起来，并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名义，作为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但实际上是利用四联总处，进一步扶植中央银行，让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

在这一阶段中，首先于1942年7月1日集中了发行，确定中央银行为唯一发行的银行，所有法币及作为法币准备金的外汇与黄金统统集中到中央银行。嗣后，国民党政府完全依靠中央银行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37年7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1942年6月底集中发行前夕，发行额已达到249亿元。到1944年底抗战临近结束时，法币发行额已达到1890亿元。如果没有法币政策的改革和中央银行的集中发行，抗日战争的长期支持是有相当困难的。

其次，在这个阶段中，颁布了公库法，确立了公库制度，中央银行力量得以大大充实。在外汇方面，1938年3月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由中央银行办理外汇审核事宜，这是中央银行专责办理外汇的开始。1942年集中发行后，所有外汇、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因此规定外汇业务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筹，并将原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

此外，采用收管各银行存款准备金，集中各大城市票据清算，办理重贴现、转抵押等放款业务，核定放款利率，并设立金融机构业务检查处，检查全国各地行庄业务。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中央银行的应有职责基本上都已具备了。此外在库存准备金中，拥有8亿数千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和600多万两的黄金，实力

还是比较雄厚的。

第三阶段 1945年到1949年

如果说第一、第二阶段，中央银行还有某些积极因素的一面，那末到第三阶段，就完全只有消极和罪恶可谈了。在这一阶段，中央银行全面支持了蒋介石打内战，采用了无限制通货膨胀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到了1948年8月19日，法币发行额达到了663万亿元的天文数字。8月20日开始，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发行后，其贬值程度较法币尤为猛烈。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为止，金圆券发行额已达67.9万多亿元，短短9个月时间内，增加了3.4万倍，是中外历史上所罕有的，这也加速了蒋介石经济政治军事的全面崩溃。

在这一阶段初期，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3月4日发布了开放外汇市场办法，规定法币外汇市价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中外27家银行依照“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进行外汇业务，同时在市场上抛售黄金以稳定物价。但结果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不到1年时间内，中央银行抛售了35400余万元美金外汇及350余万两黄金，这样庞大数字的黄金外汇抛入市场，徒然便利了外国商品的流入，增加了国内投机商的活动条件，对于稳定物价没有起什么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了中央银行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三个阶段，下面再谈谈中央银行的组织领导及其与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关系。

中央银行在组织领导方面是采用总行制，对外营业单位有业务、发行、国库三个局，管理部门有秘书、稽核、经济研究、会计和人事五个处，处与局是平级的。1935年设立中央信托局，初办时对内仍为中央银行所属的一个局，1946年起改为完全独立单位，但仍受中央银行控制，信托局理事会主席仍规定由中央银行总裁担任。

中央银行设理事会及监事会。理事会由国民党政府特派理事9人组成，9人中有实业界、商界、银行界各1人。理事会设常务理事5人。中央银行设总裁1人，兼任理事会主席，总理全行事务。副总裁1至2人，辅助总裁处理全行事务。监事会有监事7人，由实业界、商界、银行界各2人，代表审计机关1人组成。监事会主席由监事相互推定，监事会的职权为稽核全行帐目，检查发行准备金和审核预算决算。

中央银行在一般省会及经济中心，均设有分行，分为一、二、三等行，总数量多时近70处。总行直接控制的只限于一等分行及设有专用电台的二等分行。三等分行由一等分行管辖，它的业务限于处理收税及汇解军政款项。总行各局处权力很大，对外及对内凡有关业务问题，均可直接行文，发布指示。总裁与主要的各局处主管之间，有对讲电话联系，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

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平级的。在宋子文、孔祥熙时代，财政部长均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部长不再兼任总裁。分工方面，财政部主管金融行政，如银行钱庄的设立与撤销，货币金融制度的制订与修改，而关于业务经营，资金的调拨，外汇的统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调剂，均由中央银行决定。

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中国、交通、农民3行之间，没有被领导关系。各专业银行有它自己的条例，也各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董事会。但业务上要受中央银行的制约，特别是资金的调剂和各种重要业务的代理收付等要依靠中央银行。到了后期，中央银行受财政部的委托，可以随时检查各专业行的业务与帐务，并进行干预。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分工，是根据“中央银行法”和专业银行的各自条例进行，彼此之间，虽有一定磨擦，但大都是业务方面问题，并没有大的纠纷，因为中央银行的领导地位业已确立，其他各行，在业务上必须依靠中央银行的支持。

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建立

寿 乐 英

主要内容 一、七任六位总裁；二、T.V.宋的出身；三、宋子文上台后的初步安排。

一、七任六位总裁

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消亡，前后历经近21年时间，这中间，从首任总裁宋子文到末代总裁刘攻芸，计有七任六位总裁，其顺序如下：

第一任宋子文（1928年11月到1933年4月），计任职4年余。

第二任孔祥熙（1933年4月到1945年6月），计任职12年余。

第三任俞鸿钧（1945年6月到1946年3月），计任职不到1年。

第四任贝祖诒（1946年3月到1947年3月），任职差近1年。

第五任张公权（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计任职1年余。

第六任俞鸿钧（1948年5月到1948年12月），仅任职6个月，先后两任合计1年余。

第七任刘攻芸（1948年12月到1949年5月），任职仅4个月。

这中间，任期多为几个月或不足1年的，就是1年到4年余的，在动荡的形势下，除应付局面外，很难真正有所建树，比较

起来，其中算是孔祥熙任期最长、牵涉最广、关系最深。另外，在宋子文任总裁期间，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结果孙科任行政院长、王汉梁任财政部长，由王保荐徐寄庠任央行副总裁兼代总裁。当时原正副总裁和各局处头头均行辞职，王曾调稽核处总稽核朱博泉为业务局总经理。不料孙科院长上台仅3个月，即告结束，新命无效，旧任一律复职。一般不计徐寄庠的短命总裁，仍把宋子文算是一个任期。

二、T.V. 宋的出身

宋子文英文名字缩写是T.V.，人称T.V.宋，祖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宋的父母亲都是基督教徒，两个姊姊霭龄、庆龄，一个妹妹美龄，两个弟弟子良、子安，宋氏三姊妹先后嫁给了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由这种裙带关系所缔造的姻亲集团影响了国民党政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蒋介石掌握实权以后，财政金融大权一直抓在宋孔手中，孔祥熙后来居上，时人称为孔宋世家。

宋子文系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洋气十足，认为一切都是英美好，西文优于中文。例如用中文打报告，易受积压，若用英文上条陈，则很快就得到解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里，蒋介石大权独揽，谁都得唯命是从，独宋子文有些例外，摆着大舅子的架势，并仗着背后有美国人撑腰，敢同蒋介石争吵，有时甚至摔碎话筒，或推倒饭桌，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是深悉南京政情的人所熟知的事。

宋氏本有政治野心，并想借武力以自重，1929年借口整顿盐务，以两淮为中心，全力建立税警团，装备精良，拥有兵员三万余人。这种问鼎中原的举动，酿成宋蒋矛盾的极度紧张，结果以撤换宋任命的西点陆军学校毕业的总团长孙立人，改由蒋的黄埔嫡系接管改编了事，这仅是一个例子。另外蒋的军费开支，日长夜大，予取予求，漫无计划，如用来收买军阀和军队的开支，

蒋要求见条即支，宋穷于应付，十分头痛，多次磨擦和争执，最后闹到破裂。这自然不象孔祥熙时代，要什么就给什么，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那样顺从和方便了。

三、宋子文上台后的初步安排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南京建立政府初期，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名义掌握军事大权，由谭延闿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以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在全国财经会议后，宋根据中央银行条例（1935年改行中央银行法，这是孔祥熙任内的事），于1928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银行，宋自兼总裁，并派他的圣约翰和哈佛大学同学陈行为副总裁，前后担任了近21年，几与中央银行同始终。当初央行只有一个副总裁，到了1935年，为了安置张公权添设一副总裁，由张任第一副总裁，陈任第二副总裁，这是以后的事了。总行行址原在上海外滩15号，系帝俄道胜银行旧址。宋处理行务、接见宾客多在行内，有时也在祁齐路（今岳阳路）私宅。

中央银行表面上采取三权鼎立制，除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最早的理事9人，如宋子文、陈行、叶瑜（琢堂）、周佩箴、王宝仑、钱永铭（新之）、陈辉德（光甫）、荣宗敬、周宗良等，前五名为常务理事。监事会七人，如李铭（馥荪）、虞和德（洽卿）、贝祖诒（淞荪）、徐陈冕（寄廌）、林祖湑（康侯）、秦润卿、王毅臣等，李铭任主席，由全体监事推选。上述理监事名单，稍加分析，除代表工、商、银行业和审计部门外，部分是宋的人，也有部分如叶琢堂、虞洽卿、周佩箴等都是蒋的关系人。总裁兼充常务理事，并任理事会主席，集立法、行政权于一身，监事会也不起什么作用。宋在开会时，提出议案，三言两语便告解决，事实上等于宋说了算，亦无人敢持异议。

中央银行初成立时，资力比较薄弱，组织比较粗疏，业务也

比较简单，衡诸实况，尚不及中交两行，特别是中国银行。南京方面本拟发行2000万元金融公债，后来还是由中交和其他行庄凑足一个整数，作为央行的资本。当时央行业务主要集中于业务局和发行局，前者是对外营业的第一局，除办理总行业务外，并负监督和指导分行业务责任，主要业务包括国库存款和买卖公债两者。当时国库存款来源大多来自关税，由于历史原因，实权操在英国人手上，并由英商汇丰银行代收；另有一小部分附加税，即关税自主后的二五附加税，原由中行江海关收税处代收的，这部分央行开业不久就接收过来，直到央行国库局成立，统移归该局接管。至公债买卖，系受财政部委托，并委托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办理，每天从开盘到收盘，上落的差价是不小的，作为该局的一笔收入。

发行局是央行对外营业的第二局，为号召“发行独立”而成立的，主要业务为发行更换券和辅币券；接运国外订印的钞券，加以盖印签章；保管准备金及钞券的现金兑现等。根据钞券领用办法，领券时缴七成现洋、三成公债，按市价折合，多退少补；而在钞券停止兑现以前，上海总行是无限限制兑现的。由于当时发行尚未统一，央行发，中交两行也发，其他一些商业银行如中国实业、四明等银行也发，央行所发钞券信用不够巩固，在人民心目中也不顶吃香，有转换成中交两行钞券的，也有辗转兑成现金的，为防止大批钞券挤兑起见，限制颇严。

在宋任总裁末期，大约是1932年秋，成立了汇兑局，调发行局副发行席德懋主持，存在期仅八九个月。先是业务局发行关金券，供向海关交税用，不在市面上流通，初期在局内设立关金汇兑科，有挂牌行市，行市视外汇牌价而定，外汇行市向由汇丰银行执掌，央行与汇丰联合参预其事，这是央行管理外汇的初期情况，21年来的外汇业务变化多端，豪门把持舞弊，逃避资金出尽花样，象贝祖诒、席德懋辈，当时都被看作外汇专家。

此外，中央银行内有一个棉麦处，这是简称，先称美麦事务

经理处，后改称棉麦事务经理处，仅设经理一人，由席德懋兼任，这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的机构，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一切秉承总裁命令办理。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财长兼总裁宋子文曾与美国订立美麦借款45万吨，每吨作价美金75元，共计3375万美元。1933年，宋又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这次除麦子和面粉外，加上了棉花。棉麦处的设立系接受财政部的委托，办理上述实物的接运安排，以及储藏转买等事务上的手续，迨棉麦接收处理完毕，机构也随之撤销了。

内部人事方面，不用说主要都是宋的关系。如业务局第一任总经理顾立仁（贻谷），江苏银行出身，是财次张寿镛的人。后来的席德懋，由华比银行买办转来，是洞庭山席氏世家，也是宋子良的丈人。又如发行局总发行李觉是财次李调生的堂兄弟。第二任的王宝仑原系常务理事，后任发行局总发行，早年与宋发生了经济上的关系。

回顾中央银行开幕之日，宋母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妇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主持的南市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央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从这些典型的画面里，的确象征着今后中央银行的真实历程。

（本文根据李健青、莫雄、周纪曜等提供的资料，
由寿乐英整理。）

任职十二年之久的孔祥熙

李 立 侠

主要内容 一、哈哈孔的身世；二、前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兼长财政部；三、孔上台后的初期措施：（甲）废两改元与币制改革，（乙）控制金融业的步骤；四、抗日战争期间的演变：（甲）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乙）集中钞票发行，统筹外汇支付；五、从顶峰上摔了下来：（甲）孔祥熙的反对者，（乙）几起重大的舞弊、贪污、走私案，（丙）孔祥熙的班底。

一、哈哈孔的身世

写中央银行史料，无法摆脱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关系。宋是中央银行的奠基人；而孔由于掌握中央银行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大权达10余年之久，影响更大。孔祥熙的英文名字缩写是H. H.，这两个字连起来读不顺口，因此结合孔的外貌和内形，称他为哈哈孔，这个词义有褒有贬，但部属背后这样叫他，他也不以为意。孔从表面接触看，有时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对山西同乡，对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及“怀旧”之感。

孔的起家，依靠三套本钱：第一是基督教青年会。他是基督教徒，在北洋政府时期，和王正廷关系密切。王曾任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青年会中亦颇活跃，担任过东京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总干事。王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孔任会办兼实业

处长。王任中俄交涉督办时，孔任坐办（即办公室主任）。更重要的是孔与宋霭龄结合，是由王介绍。孔的前妻韩姓已故。

第二，孔与宋霭龄结婚，决定了他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显赫地位。宋霭龄原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宋与孔结合后，由宋庆龄继任中山先生秘书，并与中山先生结婚。从此孔成了中山先生连襟，曾在广东担任过财政厅长，并代表中山先生与国民军冯玉祥之间取得联系。中山先生去世，国共合作，进军北伐，不久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孔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三，孔善于经商敛财，是一个典型的“聚敛之臣”。关于孔的家世，有人说孔家原来就有钱，在山西开过票号，这是不确实的。孔的父亲孔和亭是前清秀才，原以教私塾为生，光绪末年，参加教会，接办铭贤学校，铭贤基金是由美国教会资助的。孔祥熙与宋霭龄结婚后，在山西经营商业，在榆次及太谷设立“祥记公司”，在山西全省包销美孚公司煤油及僧帽牌蜡烛、肥皂之类洋货。孔善于投机取巧，对市面行情反应灵活，在这期间，他发了一笔财，但和他后来在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任内所搜刮的财富相比，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二、先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兼长财政部

孔祥熙是1933年4月以国民党国府委员身份而被任为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1月兼任财政部长。他是先专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兼长财政部，因此他一直对中央银行比对财政部更为重视，当然中央银行的油水确实比财政部更多些。

孔在南京政府初期，先任工商部长，后工商与农矿两部合并，改为实业部，孔接任实业部长。孔对实业部颇有感情，这是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发祥之地。在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后，一部分高级骨干就是由鲁案公署及实业部援引来的。例如财政部的鲁佩璋与高秉坊，中央银行的吕咸和潘益民，都属于这一派。

当时在“宁汉分裂”之后，又促进了所谓“宁汉合作”，宁

汉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同时下野。蒋下野后去日本，汪精卫去法国。蒋去日本后不久回上海，在这期间，宋霭龄极力拉拢蒋和宋美龄的关系，促成他们的结合，得到宋美龄和宋母的同意，对蒋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为他创造了东山再起和领导国民党政府的条件。

宋霭龄在宋氏家族中是大姐，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可以左右一切。但在这种事情上，遭到宋子文极力反对，宋子文很看不起蒋介石，认为蒋成不了大事。最后还是由谭延闿出面打圆场，同意了这件婚事。谭延闿的侄子谭光曾在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任内担任过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他常常提到这件事，并举谭延闿日记为证，应该说是很确凿的。

蒋介石东山再起，以继续北伐为号召，同时为加强南京政府，又提出蒋汪合作主张，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任行政院长。汪提出在行政院内需分占三个部长席位，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由汪自兼外交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馥任铁道部长；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仍旧。孔祥熙的实业部长就这样让位出来了。

当然，孔失去了实业部并不是他本人地位削弱或失宠。他改就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和蒋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孔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国民党起自南方，国民党政府内部高层人士大多数都是南方人，而孔利用山西籍贯和孔子后裔的身份，可以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军人打交道，在孔左右就有大批山西和山东人为他出谋献策，拉拢北方军政力量，为蒋介石效忠。

蒋宋之间的矛盾和孔宋之间的不和，造成宋子文的失势和孔祥熙的兴起。孔对蒋一向是顺从的，由孔代宋，当然是蒋的旨意。宋是4月5日辞中央银行总裁，孔4月15日继任，孔在就职前一日，即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这种作法过去也是少见的。